

◎作家近况

邱华栋：行走在虚构与历史间

本报记者 张鹏禹

邱华栋是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他相继出版了两本新书——短篇小说集《十侠》和非虚构作品《北京传》，前者从历史中点燃灵感的引信，后者融个人体验于城市史写作中，虚实相生，别具一格。他既像一位游侠，穿梭于历史与虚构间，又像一位探险家和侦探，在文字的丛林中不断发现新的惊喜。

《十侠》：写侠义精神

“一箫一剑平生志，负尽狂名十五年。”龚自珍的两句诗，道出了古代文人的理想人生。大抵文人总有个文武双全的梦想，求之不得便在想象和文字的世界里圆梦，也难怪历史上出过那么多写武士、写侠客的小说，堪称“千古文人侠客梦”。无论是《史记》、唐传奇，还是四大名著里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抑或是《三侠五义》《蜀山剑侠传》，金庸、梁羽生、古龙们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书中人物的高歌猛进、快意恩仇、隐逸高蹈、仗剑天涯，总能点燃读者的阅读热情，而那个个特立独行、行侠仗义的侠客形象也深深烙印在我们脑海。

和别人一样，这也是作家邱华栋喜爱武侠小说的原因，他说：“我十几岁的时候读了很多武侠小说，还模仿着写了一本，叫《碧血侠情录》，大概有十多万字，听着很像金庸、梁羽生、古龙小说的名字。”和别人不一样的是，那时的他正在业余体校武术队练武术，早上两小时，晚上两小时，从蹲马步的基本功开始练起，到组合拳，再到长拳、南拳、通背拳套路，刀、枪、剑也都要过。于是，武侠小说爱好者、武术爱好者成了邱华栋的双重身份，他成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少年。

时间埋下的草灰蛇线往往直到回顾往事时才能看清。邱华栋没想到，过了几十年，他会严肃认真地写出一本以侠客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集——《十侠》。

2018年一次拜访恩师的契机，让他萌生了创作的冲动。“那年夏天，我在上海探望了年近八旬的黄加震先生，他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也是我练武术的师傅。黄老师见到我这个徒弟很高兴，早早穿好了对襟练功服，长刀、短刀、明器、暗器……加起来上百件家伙，摆

了一屋子。后来，我们师徒二人来到楼下花园，他一个弓步，将关羽当年耍的那种青龙偃月刀一横，单手举过头顶。接下来换我，刀是举起来了，几秒钟后，就哐当砸地上了。”邱华栋笑着回忆说。打那次起，他就想写本武侠小说，送给老师当八十寿辰的贺礼，也算给小时候的武侠梦来个“未完待续”。

武侠小说不少都脱胎于历史，受史传影响很深，《史记》就有《刺客列传》，其中不少历史人物以今天的眼光看都是侠客。邱华栋由此先选定了一个大方向，“我把它框定在以历史为背景，用武侠小说、历史小说这种方式来写。”

从春秋战国到明清，《十侠》的故事时代背景各异，但都精准地嵌入到历史风云之中。《击衣》写春秋晚期刺客豫让与赵襄子的恩怨；《龟息》以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为背景，虚构了名为龟息功的吐纳之法；《易容》从王莽新朝的覆灭敷衍出来；《刀铭》取材于《后汉书》刺杀大将军梁冀的故事；《琴断》写魏晋名士嵇康；《听功》取材自《旧唐书》，以唐太宗李世民换太子之事为线索；《画隐》讲的是宋徽宗时期一个关于画的故事；《辩道》和蒙元时期忽必烈召开的一次佛道辩论有关；《绳技》想象明建文帝败于燕王朱棣后的踪迹；《剑笈》部分情节取材自《古今怪异集成》，背景是乾隆皇帝让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十个朝代，十个侠客，十种功夫，十个故事，绘制出一幅千古侠客行状图。

“《十侠》以大家清楚或者隐隐约约知道的一些历史人物、事件为依托，同时又想象了十种技艺、兵器，每篇小说对应其一，虚虚实实地把它写出来，其中彰显出的侠义精神是我表现的重点。”邱华栋说。

在《击衣》中，豫让为报智伯瑶的知遇之恩，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刺杀赵襄子，为主公报仇。豫让没在其如厕时行刺，赵襄子发现后感念其不乘人之危，放了他；第二次刺杀，豫让因曾领受赵襄子的不杀之恩而内心矛盾，赵感佩其忠义，让豫让以剑击衣的方式完成夙愿。其中的忠义、耿直、“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传颂千秋。

“《击衣》也写出了豫让和赵襄子之间的惺惺相惜。类似表现侠义精神的



邱华栋近照 资料图片

内容，在这本书中还有不少。”邱华栋说：“《史记·游侠列传》中评价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我想这种侠义精神在今天依然有其价值。”

《北京传》：为城市立心

文学与城市有着怎样的关系？远的说，有东汉班固《两都赋》对长安与洛阳的赞颂，有宋代市井生活与话本小说的紧密联系；近的说，有新感觉派对上海十里洋场的形绘，有彰显南北城市风格差异的地域文化书写。城市既是不少文学流派得以生成的沃土，也作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不断拓展着文学空间的边界。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叶兆言《南京传》、孔见《海南岛传》、叶曙明《广州传》、胡野秋《深圳传》以及徐风展现江南文化变迁的《江南繁荒录》等作品的出版，融汇文学笔法与非虚构创作旨趣的城市传记不断给文坛带来惊喜。这其中绕不开的一部作品，就是邱华栋的《北京传》。

“2017年夏，当时我正在读英国作家兼记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写的《伦敦传》，很厚的一大本，有80万字。有一天我见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聊天中说了一句‘读了这本《伦敦传》，我觉得我也能写一本《北京传》’。没想到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没多久他就向我约稿。”邱华栋说。

把有着3000年历史的一座古老都城用传记的形式写下来绝非易事，邱华栋能有这样的底气，不得不说缘于他多年来对北京观察、思考与创作实践。

对他来说，1992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从上世纪90年代起，邱华栋就以《乐队：摇滚北京》《手上的星光》等作品建构起一个迥异于传统北京的现代北京形象。他曾说：“在美学多元的时代，判断自己是哪一元至关重要。对于我而言，不可能去虚拟历史，我们这一代对当代中国历史缺乏体验记忆，我因而对当下生

活非常感兴趣。我生活在城市中，便把写作的视点放在以城市为背景了。”这个城市就是北京。1995年到2008年，邱华栋创作了总题为“北京时间”的4部长篇小说：《白昼的消息》《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展现出全球化时代中，身处北京的知识人世俗生活与精神境况的碰撞。

从虚构的小说到非虚构的城市传记，除了几十年的资料收集研读，外国城市传记的启发，邱华栋在动笔之前很下了一番功夫，在他看来，如何写决定了作品的成败。“给一座城市立传，是一种非虚构文学的新写法、新题材，我希望呈现出北京3000年城邑史的时间轴线和空间移动的图景，因此在结构上采用主章和副章结合的写法：主体章节是城市演进过程中的重点叙述，描述出朝代更替过程中城市的状态；副章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和建筑、规划等，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叙述。”比如第一章“蓟城与燕都”，主章从北京的自然地理环境写起，之后结合考古发现和史记记载溯源北京建城之始——蓟城，再讲燕都的历史沿革，给读者以清晰的脉络和线索；副章则以作者探访幽州董家林遗址和永定河为补充，古今并置，辅以直观的体会。主、副搭配，主干清晰可辨，副线点缀强调，颇富层次感。

除序章和终章外，《北京传》从第一章3000年前的西周蓟城和燕都，到第十一章对未来发展世界城市的展望，在20多万字的篇幅中，邱华栋完成了一次对北京城市历史沿革、建筑规划和人文记忆的巡礼。其中既有史料的爬梳，也有感性的经验体悟。“资料是死的，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观察才是最重要的。这在《北京传》中也有所呈现。”邱华栋说。

在第二章“唐幽州城”的副章“潭柘寺的守望”中，邱华栋想象一位古代僧人行走在幽州西北部的山里，寻找着修建寺庙的山水俱佳之处，最终在一眼潭水边找到了地方，建起了嘉福寺，后来称作潭柘寺。造访潭柘寺的经过，被作家详细记录下来，举凡周遭环境、大殿形制、秀丽风光、文物遗迹皆诉诸笔端，可以视为一篇发思古之幽情的游记。

为北京立传，主要关注的自然是历史的一面，但正如邱华栋所说，他的写作有那么多“厚今薄古”，“我笔下的北京不是远去的北京，而是当代的北京，此刻的北京，崭新的北京，我自己的北京。”拥抱当下，又向未来敞开的，是《北京传》的态度，也是全书以“‘中国尊’的瞭望”为序章，以“未来之城”为终章的原因。对智慧城市、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副中心建设、雄安新区、京津冀一体化、大兴新机场建设等当下北京发生着的重大现实，邱华栋都有所涉及，让《北京传》的视野和眼光从历史遗迹与泛黄的典籍延伸到跃动的当下，汇入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滚滚洪流中。

《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专家点评

2020是长篇小说的大年

本报记者 张鹏禹

2月4日，由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社主办的第17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暨第22届《当代》文学拉力赛颁奖典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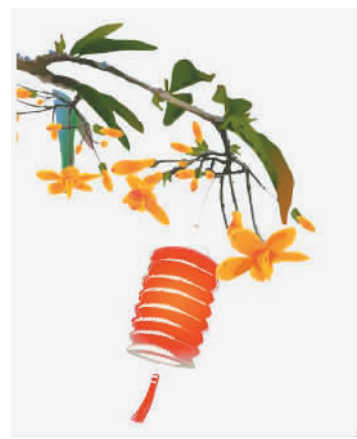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对2020年国内长篇小说的整体状况做了综述，认为“烟火气”和“艺术气”是当年小说创作的两大突出特点。迟子建的《烟火漫卷》、王松的《烟火》、滕肖澜的《心居》等作品写普通人的生活，具有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而冯骥才的《艺术家们》、路内的《雾行者》、房伟的《血色莫拉特》、李宏伟的《灰衣简史》等作品则关注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或文艺青年的生活，对世俗之外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入开掘。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认为，张忌的《南货店》细致摹写出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南方乡镇供销社的商业活动与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令人印象深刻；张平的《生死守护》实现了反腐题材的突破；胡学文的《有生》避免了“百年小说”写法中常见的历史压倒文学的问题；贾平凹的《暂坐》实现了个人创作风格的突破。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孟繁华、《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等对过去一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了点评，纷纷表示，2020年可以视作中国长篇小说的“大年”。

论坛上宣布了由评阅人投票、专家线上投票及读者投票数目按比例相加评选出的2020年度长篇小说五佳作品，分别是迟子建的《烟火漫卷》、胡学文的《有生》、王蒙的《笑的风》、冯骥才的《艺术家们》、张忌的《南货店》，2020年度长篇小说最佳作品为迟子建的《烟火漫卷》。读者网络投票排名前五的长篇小说作品是吕铮的《三义戟之纵横四海》、冯骥才的《艺术家们》、陈佳勇的《蜗角虚名》、钟求是的《等待呼吸》、贾平凹的《暂坐》。

活动上还揭晓了第22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总冠军，为贾平凹《暂坐》。邵丽的《风中的母亲》获第22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中短篇小说总冠军”，李修文《诗来见我》专栏作品获得第22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散文总冠军”。



◎百家谈

和外国朋友聊文学里的春节

刘江凯

“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开宗祠，扫上房，安排年酒，接收货单，《红楼梦》第五十三回描写了荣宁两府操办年事的情形，和王安石《元日》诗中桃符换旧符，爆竹除旧岁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千百年来，春节像一根可以越时空的丝线，将古今中外的中华儿女紧密地打成了一个中国结。

春节也是一个和亲朋好友互送祝福的重要节日。在和国内外朋友闲聊互拜早年的过程中，我不由好奇——外国人如何了解中国春节？会不会通过文学作品呢？

适逢英国剑桥大学读文学博士的师妹施冰冰发来信息，便说到我的想法。我们推想，包括汉学家在内，大概不会有太多外国人能注意到文学作品里的春节，遂决定通过我们各自认识的外国朋友进行一次简单的调查。

法国汉学家白乐桑（Joël Bellassen）说，外国汉学家可能会通过文学作品或电影了解春节，普通外国人主要还是通过当地媒体如电视台、报纸等了解。在巴黎，每年春节期间的游行、放鞭炮、挂灯笼等活动，给外国朋友留下直观感受。他的观点和另外两位青年汉学家大体一致。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的罗流沙（Alexey Rodionov）认为，春节是外国人最了解的中国节日，但很少通过文学去了解。他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俄罗斯举行的中国文化节很多，春节是规模最大、人流量最大的。比如在俄罗斯18所孔子学院和5所孔子课堂的文化活动中，“过中国年”都是重点。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杨爽（Justyna Jagusik）也认为，一般读者不太会通过文学了解春节，更多是通过报纸或网络读到中国春运等信息。想想也很正常，如果让中国读者谈外国文学里的重大节日，恐怕也说不出什么。

有趣的是，也有受访者反复提到了两部令他们印象深刻的作品，分别是鲁迅的《祝福》和曹雪芹的《红楼梦》。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张仲思（Tristan Brown）曾在四川大学交换学习期间，在广元的朋友家过春节，专业背景和亲身经历显然让他对春节有更多细腻的感受。他提到了古典诗词和《红楼梦》中的春节，最喜欢的是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认为该词准确抓住了节日期间的欢乐场景，特别是最后一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如照片般为我们定格了节日的美好体验。剑桥大学东亚系博士沈若昆（Nick Stember）表示，自己印象最深的是《祝福》。他说，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快乐的故事，但却给予了我们诸多思考。现在在韩国圆光大学工作的李嘉英（Lee Gayoung）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也在北京过春节，她对《祝福》最后一段印象极深。“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罗流沙也提到了《祝福》，但他同时指出，许多中国文学因为没有俄语译本，所以从根本上限制了被普通读者看到的可能。我想《祝福》和《红楼梦》之所以被反复提及，和它们的译本多、经典性强密不可分。

这些热爱中国文学的外国友人也对春节和外国节日做出比较。罗流沙认为，春节类似俄罗斯人过的新年节，同样是全家团圆，吃喝玩乐，因此好理解、好接受。他认为俄罗斯人对春节文化的了解相对较浅，主要限于属相、鞭炮、红灯笼和饺子，很少人知道中国年画的存在，属相则非常受欢迎，大概与西方人习惯的星座有关。李嘉英则觉得春节与韩国的“旧正”都是农历新年，是民间最古老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虽然中韩两国过春节的习俗各有特色，但韩国与中国对春节的传统观念非常相似。沈若昆则注意到节日装饰方面，圣诞节有圣诞树、圣诞老人、圣诞村等具有公共性的城市大道景观，春节有对联、福字、门神等，似乎更偏重于家庭。在西方，每年会有各种关于圣诞老人的电影，中国十二生肖或许也可以拍成电影，增加“年味”。

虽然外国朋友通过文学了解春节十分有限，但春节的节日氛围、文化内涵却对他们有着不小的吸引力。文学以外，大众文化发挥的作用恐怕更大。

世界各地的节日传统固然不同，但人们通过节日寻找幸福的道路始终是一致的。今夜，让我们共同拥抱一个崭新的辛丑年！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第76天》全景展现武汉抗疫历程

本报电（曾宪钦）近日，“一曲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颂歌——熊育群《第76天》新书发布会”举行。

《第76天》是熊育群创作的一部抗疫题材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该书以时间为轴线，严谨客观而又饱含深情地记录了一个个为武汉抗疫做出贡献的英雄，刻画了从武汉通道关闭至解禁76天里的人情人心，展现出疫情面前中国人民不屈的精神和各地人民援助湖北的深情。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评价说，我们特别需要一个全景式视角去书写这76天里武汉抗疫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熊育群作为一个作家，走上前去，拿起笔有力地把它写了出来，交给今天的和未来的读者，交给中国的和世界的读者，可以说是阶段性地达成了这个使命。

作者熊育群说：我希望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采访和查找资料时就像侦探似的，一层层深入，破解一个个疑团，我坚持对重要事件和细节查找旁证材料，有时甚至通过三方印证。作品只有真实，才经得起经历了这场疫情的人，才能对得起历史，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新作推介

个人的故事和国家的故事

——评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

孟繁华

《惊蛰》（《十月·长篇小说》2020年第6期）的题目，是一个比喻，也是一个隐喻。小说写主人公凌云的成长史，这是一个乡村青年的命运史，同时又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乡村史。

《惊蛰》上中下三部分，都是凌云求学路上在绿皮车厢的回忆，绿皮车承载着这个青年向前走，年轻人的思绪则向后奔涌。在交代凌云来时路时，讲述其艰辛的成长过程，也就交代了凌云走出大山求学的内在动力。

列车载着他向前走，是因为有沉重的过去、沉重的因袭，他不是要成名成家，不是要出人头地，而是要过上尊严的生活。这个尊严不是个人的，同时也是家族的也是乡土的。于是，凌云青的个人奋斗就构成了一个隐喻——那是乡村中国的奋斗，是贫苦的家国奋斗，是一个群体和一个时代的惊蛰之醒。于是，杜阳林通过凌云青，把个人的故事，讲述成了一个国家的故事。凌云青和高加林（路遥《人生》）、陈金芳（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翟小梨（付秀莹《他乡》）这些来自乡村的青年形象都非常不同。高加林是一个要走向“现代”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的脚步，包括爱情，但他最后也没有实现个人的愿望。小说喻示了乡村中国走向现代的艰难；陈金芳是一个兼有乡村经验和都市经验的青年女性，都市生活开启了她对生活和对人的新的理解和想象。因此，她“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这个想法没有错，但方式错了，因此也没有实现；翟小梨从农村到S市一直到北京，看似实现了从前现代迈入现代的过程，但她付出的是巨大的情感代价，几乎不堪回首。凌云青与这些乡村青年的道路都不同，他是经过前现代贫困生活浸泡过的青年，母亲、兄弟姐妹和个人的经历，激发了他刻苦学习走出乡村的意志和决心，他是为尊严走出川北山沟沟的，他是一个中规中矩却用努力改变命运的青年。因此，这是一部非常励志的小说。

《惊蛰》中，有些情节需要裁剪，比如凌云的腿出了问题，从发现到江湖郎中吴中孝医治好腿疾，文字过长。小说在这个过程中写了几家人的态度，特别是母亲秀英借肉的情节，读过之后如万箭穿心；当然也写了小姑娘陈吉祥，她将自己的零花钱交给了凌云的母亲，这一段很感人。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朴素无华的小说，是一部有真实体会和时代感的小说。

